

引文格式: 顾坚. 差序格局理性化背景下当代青年价值观研究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6): 109-116.

# 差序格局理性化背景下当代青年价值观研究

顾坚

**摘要:** 青年能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未来。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家庭伦理观与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经济伦理观并存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行为与思想中, 由此产生出差序格局理性化的思维及行为模式。婚恋观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恋爱与等级婚恋并存, 就业观冲突主要表现为零风险维生型就业与冒险创业并存, 交友观冲突表现为单纯情感与利益算计交织。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 并以“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引导青年, 从而构建文化熔炉的“大思政”格局, 以此培育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观。

**关键词:** 青年; 价值观; 差序格局; 理性化

**作者简介:** 顾坚,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常州大学城市建设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空间正义问题研究”(19CZX061)。

**中图分类号:** D432.62; D64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6.0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sup>[1]333</sup> 青年人能否担负起时代使命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潜力的大小。青年人能否牢记使命并负重前行的关键不在于其事实判断层面的“能不能”, 而在于其价值层面的“想不想”; 前者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程度, 后者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 青年能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未来。当代青年人的价值观根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与此同时, 也反映着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的时代特质, 整体呈现出“差序格局理性化”的特征。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才能让青年人的价值观不再“空场”, 从而真正拥有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 一、青年价值观差序格局理性化研究的缘起

差序格局理性化指中国传统血缘宗亲秩序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下, 转变为理性化的利益秩序。它使得人们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最看重的是对方是否有利于满足自己各方面的利益需求, 而情感的影响作用则逐渐被淡化——从“熟人圈”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当下中国“地的城镇化”进程过快, “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 人际交往方式呈现出“半熟人圈”式的转型。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青年人而言, 家庭伦理与经济伦理相互交织: 一方面, 作为“家庭人”, 他们处在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原生家庭中, 以宗法群体为本位; 另一方面, 作为“经济人”, 他们处在以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交往秩序中, 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本位。这两种相悖的伦理价值观

念并存于当代青年的思想与行为中,造就了当代青年价值观的矛盾性、复杂性、流变性、分裂性。

当代青年价值观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当下,“青年价值观”受社会多元化思潮的冲击,呈现出迷茫、矛盾甚至“空场”的状态。青年价值观的整合及其建构问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方面。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各领域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路径;第二,家庭教育对青年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第三,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文化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与冲击。可见,青年价值观有如下特点:第一,受众群体广。全国各地各个高校均投入价值观构建行列,这不仅是思政课程的重要任务,更是课程思政的必经环节。第二,影响因素多。原生家庭、学校环境、社交媒体、赛博空间等均可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当代青年价值观多元化正是当下的时代写照。第三,更新换代快。当代青年对新鲜事物学习力最强,“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一〇后”等用以指代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称谓,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时代指征,却有相对明显的现实差异。若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群视为“前者”,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视为“后者”,则前者是新鲜事物的“学习者”,后者是新鲜事物的“原住民”。同时,前者又是后续年轻人原生家庭的主要构成,一代传一代,一代易一代。因而,研究把握视角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异。

差序格局作为一种研究社群行为的新型视角,揭示了中国特定社群行为的内在动因,越来越被当作中国本土的原生视角来处理中国“特色”的问题。其所涉范畴已从狭义的“在地式”转变为广义的“在场式”,该词的使用早就超出了乡村社会的边界,进入了企业管理<sup>[2-5]</sup>、法规制定<sup>[6-10]</sup>、高校理论<sup>[11-15]</sup>、家庭伦理<sup>[16-18]</sup>等多个领域,成为研究特定社会群体思想与行为的更“接地气”的论证模式。此处的差序格局已被拓展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熟人圈”式的人际交往模式。里面的血缘关联和地缘关联虽已淡化,但“熟人圈”式的交往习惯未变。这种“熟人圈”对内具有包容性、约束性、责任连带性,对外具有排外性。

受西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思潮影响,我国当代青年人群原生的“差序格局”开始逐渐走向“团体格局”<sup>[19]40</sup>(泛指由西方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界限分明的团体架构),呈现为半开放式的“熟人圈社会”,导致了一系列看似矛盾的价值观悖论。差序格局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已经从半隐性层面开始走向隐性层面。换言之,人们对差序格局这种内在心理机制的关注已逐步消解——走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性化不同于西方流行的“理性主义”。西方的个人出发点在于原子式的个人,并非不存在家庭因素,但相较于中国而言,是个人因素大于家庭动因的,此时的“私”是个人之“私”;中国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个人,只存在家庭中的个人或者团体中的个人,这种“私”是团体之“私”,而这个“熟人圈”的边界是弹性的,会随着处于圈子中心之人的能力和地位的强弱高低而变大缩小,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爱有差等的。

## 二、差序格局理性化的内涵及特点

当代青年价值观呈现为差序格局的传统宗亲文化与理性主义价值观并存。传统乡土伦理以乡村地缘为界,以血缘宗亲为基,建构出了“差序格局”式的“熟人圈”秩序。费孝通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这个社会结构的架格是不能变的,变的只是利用这架格所做”<sup>[19]43</sup>。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发出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所谓“熟人圈”的“圈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中心个人能量的大小适时增大或缩小,但基本的波纹格局不

变。若将村庄视为一个共同体单位，那么村界也是差序格局中的“圈界”，界可变动，但基本格局不变。

贺雪峰也看到了近现代差序格局的变化，他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sup>[20]</sup>。他将差序格局的这种转变称为“差序格局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指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社会”中的“理性”。一方面，“理性化”一词对应着“感性化”，但传统的差序格局不仅包括“爱有差等”的“差”，还包括“礼治”等级的“序”，因而，理性化更多涉及的是主观情感层面的寄托，有关社会地位的客观等级差异并未涉及。另一方面，“理性化”一词的表达较为含混，农民选择遵循乡村礼治秩序行事，若将遵循礼治纯粹视作情感行为，那么该行为本身就是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理性主义中的“非理性主义”或者“不是理性主义”并非没有理性，更不是不讲道理，而是讲另外一类道理，这意味着“理性”仍旧存在<sup>[21]5</sup>。可见，用“理性化”来描述差序格局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不太恰当。相比较而言，针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时空变迁和当下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在场”<sup>[22]</sup>二字就显得更为恰当。

差序格局作为乡村社会的组织架构不是二维平面的，而是三维立体的。从平面来看，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sup>[19]43</sup>。费孝通还强调了，这种架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主义预设了在团体格局的大环境中，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独立存在的前提。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立个人的存在，存在的只有集体中的成员。换言之，传统中国不存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存在的只有“集体之整体与集体中的单个成员的关系”<sup>[21]26-27</sup>，这才是对中国“公”与“私”关系最为恰当的解释。因此，富于伸缩的差序格局中公与私是相对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sup>[19]46</sup>，衡量孰公孰私，标准完全看中间之人圈定的集团格局有多大。如果他人这个集团圈内，那么对于中间人的评价是大公无私；反之，在圈外，则评价为自私自利。这种弹性的、差序的标准是时空交错的，源自纵向交错之“序”。

从纵向来看，“序”强调的是不可逾越的秩序、等级，这种等级无法以“己”的意志随意转移，但又没有阶级对立那么强烈，是一种等级式的“应当”，人们可以通过遵守“序”（外在表现为礼制）以获得等级上的流动。礼治秩序带来地位的尊卑。但为尊者同时为上者之卑者，为卑者同时为下者之尊者。换言之，尊卑的权力关系具有时空交错性，礼治秩序中存在的平等也是差序平等，从而形成的人格是差序人格。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个人绝不是不可再分割的、具有本元意义上的最小单位，个人只有存在于一系列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中不断根据具体情境（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角色以及存在的意义，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行动。由此，才会得出罪行的惩罚轻重往往取决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等级关系这样的弹性结论<sup>[23]</sup>。

青年价值观由此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认同父母辈宗法关系格局—反抗并崇尚自由—构建属于自己的差序格局并诉诸理性的自由三个阶段。

### 三、青年价值观差序格局理性化的表现及成因

原生家庭差序格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使得青年价值观呈现出错综复杂

的多维度并行模式。婚恋观、就业观和交友观等均体现出矛盾的、复杂的、分裂的特性。相矛盾甚至相悖的观念在当下我国青年人身上能够同时存在。这里的“同时”并非指对同一事件来说两种矛盾的观念并存,而是指同一人在对待不同事件的处置态度和处置方式上,两种观念会因地制宜地发挥其作用。

### (一) 青年的婚恋观冲突

婚恋观冲突主要表现为自由恋爱与等级婚恋并存,婚后家庭夫妻双方父母越位、夫妻缺位的现象。“婚恋观是指个体对于恋爱、两性关系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和根本态度,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婚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sup>[24]</sup>作为基本看法和根本态度,婚姻观本身是较为稳定的存在。然而,当下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过程却往往存在着不稳定甚至相悖的现象。一方面,自由恋爱与等级婚恋并存。中国古代传统恋爱观提倡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等级婚恋观,这与西方提倡的自由恋爱观是相互对立的。而如今这两种观念却可以同时存在于青年人的婚恋过程中,即“中国式”相亲:父母与子女以小家庭为单位审视婚恋对象。两种婚恋观排斥与交融并存。另一方面,婚后家庭存在夫妻双方父母越位、夫妻缺位的现象。这种“越位”是相互的,即婆婆与媳妇均有“越位”的思维惯性:婆婆将儿子继续视为小家庭中的家人,将插手儿子家事视为“应当”;媳妇未完全脱离原生家庭,将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帮助视为“应当”;丈夫与妻子均未真正意识到二者组成的“小家庭”的边界及其所须承担的责任,将婚后双方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帮助”均视为“应当”,从而导致夫妻“缺位”的现象。再加上,当下已基本不存在“族长”“族规”“家风”“村规民约”等外在伦理约束力,“有爱即合”“无爱即离”<sup>[25]</sup>等非传统婚恋观越来越成为当代青年人相处的“潜规则”。但婚恋关系绝不仅仅依靠情感维系,责任感也是维系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

究其本因,婚恋观冲突源自差序格局下的家庭观不匹配。传统乡土思维以家族为行为单位,“家”的范围不仅包括祖孙三代,甚至还包括堂叔伯表亲等旁系分支。这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人口迁移较少,地缘与血缘高度集中,家族圈、生活圈、工作圈高度重合。乡村城镇化后,人口往城市迁移,地理聚集模式也从传统村落逐渐转变为城市公寓房,社交模式逐渐向“陌生人”关系转变,传统大家族已难以存续。城乡变迁再加上独生子女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家族的族群范围越加缩小,一家三口逐渐成为“标配”。在此,父辈的“大家族”观念与子女辈的“小家庭”观念相互交织。当代青年群体可能并不完全认同“大家族”的人际交往模式,但脱胎于原生家庭,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家族式人情伦理。因此,婚恋冲突源于传统家族与新兴小家庭的观念冲突。当代青年人正处于新型家庭观与传统家族观的冲突时期,较为清晰的个人家庭角色观还未形成,这不仅是个人的成长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而今父母与子女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中国式”相亲、“中国式”育儿等等。但这对于“小家庭”夫妻双方独立人格的形成无太多益处,且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已处于中上水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也不宜蹉跎在下一代的生活琐碎之中。

### (二) 青年的就业观冲突

就业观冲突主要表现为零风险维稳型就业与冒险创业并存。前文述及,父母以“大家族”为思考原点,这个“大家族”不仅包括当下三口之家,还包含着儿女未来成家生育下一代后的大家庭。此时的“大家族”不仅是一个家庭单位,更是一个经济单位。若想让子孙后辈获得体面的生活,“大家族”内的代内分工甚至代际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父辈看来,工作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保障性是第一位的。但在子女看来,工作必须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否则,工作看起来再稳定也难以激发自身动力。

究其本因，就业观冲突源于农业维生型思维与市场投机型思维的共存。中国社会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农民的维生型思维也常被称为“保守思维”，与之相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冒险思维”。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资本的积蓄；此外，除了种田，他们很难有其他就业的能力与机会。因此，看起来，农民像是被“拴”在了土地上，有的甚至“为了增加一点点产量，（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其劳动强度和时间都令人难以想象”<sup>[26]16</sup>，查耶诺夫将其称之为“自我剥削”，即自己成了自己的压榨者和剥削者。但是这种“自我剥削”是有一个“防御圈”<sup>[26]30</sup>的。在“防御圈”内，以维持家庭基本生存为优先。而一旦获得超过“防御圈”的物质资料，一部分生存小农会“小富即安”，追求更安逸的生活；而另一部分农民则会转变为理性小农，尤其对待圈外之人，总是表现得精于算计。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在于追逐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并非为了捍卫社群共同体的生存权与互惠准则。可见，农业思维的“防御圈”内在就包含着矛盾因素。青年人在就业过程中也是如此，一方面，羡慕能赚钱的创业模式；另一方面，又担心创业不稳定可能带来的未知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创业压力，使得稳定的“铁饭碗”越来越受到青年人的推崇，近年来愈加内卷的“考研”和“考公务员”热潮恰好也印证了这一点。

### （三）青年的交友观冲突

交友观冲突表现为单纯情感与利益算计交织。青年人在交友过程中不仅会考虑与友人是否相处融洽、志趣相投等情感因素，还会考虑朋友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等利益往来因素。

交友观冲突源于熟人圈社会的“人情”观与陌生人社会的“法治”观冲突。在熟人圈社会，一方帮助另一方获得相应的名声和权威，以保证自己在圈子里的体面。“面子”是熟人社会的产物，其生产与再生产导致社会性分层。乡村熟人社会的主导地位往往由上层精英占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付出人品、能力、人缘等社会资源，在“吃亏是福”“要做事，先做人”等实践中进行面子要素的沉淀和积累。“居于‘面子’中间等级的人则逐渐成为人情的亏欠者。上层在实现‘面子’积累的同时逐渐成为村庄公共秩序维系之不可或缺的力量”，以获得“其公共性身份和统合型权力，从而形成以上层为中心的关系聚焦效应”<sup>[27]</sup>。而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情交往模式已脱离稳定的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的市场经济秩序中。此时，人情向上层的聚焦效应越来越弱，人情的私人性越来越强，甚至出现了人情与资本结合的产物，即“人情寻租”。而“人情”内含三种意义：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人之常情、情面和恩惠<sup>[28]</sup>。这就导致了人情不够之时，只要礼重，仍能达成人情寻租的目的。于是，钱权交易屡禁不止。此时的“人情”，成了人们维持自己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筹码，通过对“人情”的付出或收取，维持自己的人脉网。青年的交友观正是包含着情感与利益交织的要素。一方面，校园内的青年交往有其内在秩序：交友以志同道合、成绩优异、合群等为优先因素；利益往往不是直接关联因素，而是情感调剂因素。另一方面，社会中青年间的人情往来也逐渐被市场经济价值观所规训，逐渐社会化、物质化。

## 四、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培育途径

近几年，学界对“差序格局”在青年交往关系中的影响关注得越来越少，因为“差序格局理性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词语越来越被其他“非历史性”的多元化词语所替代，比如人力成本、管理资本、道德资本等。这些语词范畴将人际交往利益化、社会关系资本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量化至极致，人成了原子式的个人。这种研究方式更适用于处在完全市场经济生产中的理想个人模型。然而实际上，如同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

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9]505</sup>。“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sup>[29]164</sup>我们不仅要看到经济行动的表象,更要剖析青年人对这种行为的理解。只有遵循着差序格局理性化支配下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养成的文化脉络,才有可能剖析其行为的内因,从而在价值观层面给予其指引。

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指引。如今,差序格局的思维模式仍在影响着青年人,如想让青年人打从心底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入手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因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sup>[30]312</sup>。因而,青年人价值观的培育须尽可能从中华博大精深、历史文明入手,找寻素材,以此为基础形塑价值观念。其深度挖掘并应重点培育的途径包括以下两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一致的伦理文化和与差序格局思维模式相互吸引的思维架构。

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通过深度挖掘与梳理,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伦理文化作为培育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文化中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部分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补充,为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助益。此外,也得警惕古代文化中封建、迷信、神秘的成分,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30]315</sup>。应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价值、教化价值、实践价值,将其融入青年人的知识传授、媒体宣传、实践研究过程中。

以“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引导青年,把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家”与“国”的位序进行思维模式的改造与转型,使之具备差序格局思维的架构与特征。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sup>[31]</sup>他通过类比的方式,将家庭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观念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家庭道德的认知,将“孝”这一家庭伦理道德准则视作政治生活领域的“忠”这一德性的伦理基础,由此提倡的“忠”“孝”观念具有较强的历史渊源与群体认知度。此时,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青年,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青年,让青年人既明确自身肩负的时代责任,又受到目标的引领与感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sup>[1]333</sup>。由此,构建出“我-家-国”的共同体,从而拓展青年人行为处事的格局。

优秀传统文化与“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为形成具有“文化熔炉”功能的大思政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构建“大思政”格局,应以思政课程为主导,以课程思政为抓手,以点带面,以此带动家庭、社会的“大思政”格局。应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开好思政课程,做好课程思政。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青年人接触理论教化的第一界面,担负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sup>[1]329</sup>。传统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教育总是推崇“大而全”的政治性“宏大叙事”,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当代青年人更偏好碎片化、流变快的实用性知识。思政课程应与时俱进以契合时代精神,充分利用流媒体、短视频等工具平台辅助教学。在强调理论教化的同时,还“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sup>[1]331</sup>。换言之,在课堂外的家庭、

社会层面也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文明建设。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是一个整体，三者均会对当代青年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只有从青年成长的内外环境入手，做到理论引导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手段相衔接，对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正向合力，才能带来双向互动的良性效应，达到培育新时代青年的目的。

## 五、结语

综上，青年价值观的研究不能脱离实际抽象构建，因此必须考察差序格局理性化这一特殊状况。差序格局理性化隐含在民众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往往表现为相悖的行为模式和思想状态。这是时代转型、经济发展过快，而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形成无法跟上时代节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今，培育当代青年人的文化自信成为重中之重。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只有让青年人学会用“集体主义”的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才可能真正打通知行合一的通道，获得自信。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 刘子旭，王满. 代际传承背景下家族企业继任二代创新投入水平研究：基于差序格局视角 [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 (12)：80-96.
- [3] 李平，丁枫. 基于差序格局的企业组织内部上下级行为决策博弈研究 [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 (5)：83-91.
- [4] 王建斌. 差序格局下组织行为特征及其管理方式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 (2)：58-62.
- [5] 王萍，连琴燕，陈德峰. 家族企业差序化治理演进逻辑与成长路径：基于温州民营家族企业的案例研究 [J]. 经营与管理，2022 (1)：115-121.
- [6] 申卫星. 数字权利体系再造：迈向隐私、信息与数据的差序格局 [J]. 政法论坛，2022，40 (3)：89-102.
- [7] 陈荣昌. 基层行政执法差序格局的生成机制与法治化解 [J]. 社科纵横，2020，35 (8)：92-97.
- [8] 叶秀，董慧慧，李岚. 论差序格局下的我国环境信用法律制度建设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11)：76-79.
- [9] 张洁. 德治还是法治：差序格局中社会治理的规则选择：基于公众态度的视角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0 (6)：88-94.
- [10] 唐平秋，唐宇婷. 差序格局视域下的行政伦理困境成因与出路 [J]. 探索与争鸣，2015 (3)：58-61.
- [11] 陈伟. 高等学校的差序格局及其变革 [J]. 高等教育研究，2015，36 (6)：1-8.
- [12] 郭欣. “差序格局”视域下的高校管理育人：行为特征、结构要素与实施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 (3)：47-51.
- [13] 左崇良. 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 (12)：32-37.
- [14] 王思懿. 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差序格局的理论视角 [J]. 重庆高教研究，2018，6 (1)：78-90.
- [15] 俞兆达.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焦点的质化考察 [J]. 当代教育论坛，2022 (2)：1-11.
- [16] 周飞舟. 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 [J]. 学海，2019 (2)：11-20.
- [17] 武志伟，马广海. 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 [J]. 齐鲁学刊，2017 (3)：98-104.
- [18] 周恩毅，温泉，孙彦坤. “差序格局”下中美核心家庭的非趋同性分析 [J]. 浙江社会科学，2013 (9)：105-111.
- [19]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
- [20]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 [M]. 修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3.

- [21] 谢遐龄.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 [22] 皮埃乐·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刊 [M]. 李猛, 李康, 译. 邓正来, 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8.
- [23] 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J]. 社会学研究, 2006 (4): 201-213.
- [24] 王飞. 当代青年的婚恋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17~34 岁年龄段的青年调查数据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 (7): 73-76.
- [25] 宋希仁. 家庭伦理新论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8 (4): 65-71.
- [26] 詹姆斯·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M]. 程立显, 刘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27] 杜鹏. “面子”: 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 63-72.
- [28] 孙春晨. “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 [J]. 道德与文明, 1999 (1): 20-23.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3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76.

## On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tionalization of Differential Pattern

Gu Jian

**Abstract:** Whether the youth can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is crucial to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 family ethics based on patriarchal group and the economic ethics based on individualism coexist in the behaviors and thoughts of the youth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produces the thinking and behavior mode of rationalization of differential pattern. The conflict of love and marriage view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coexistence of free love and hierarchical love; the conflict of employment concept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zero-risk subsistence employment and risky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flict of friendship view is manifested as the interwoven pure emotion and interest calcul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ational cor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youth can be cultivated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guided with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same structure of the clan and country”, so as to construct the “big ideology and politics” pattern of the cultural melting pot and cultivate the youth valu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youth; values; differential pattern; ration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2-07-17; 责任编辑: 陈鸿)